

张文奎

人文地理论文选集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 文 奎
人文地理论文选集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长春

编选委员会:

主任:陈 才

委员:孟春舫 袁树人 倪维素

刘继生 王 力 路 虎

(吉)新登字 12 号

张文奎人文地理论文选集

ZHANG WENKUI RENWENDILI LUNWENXUANJI

责任编辑:江树芳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姜 群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10 号)		长春市新华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印张:7.75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0 千		印数:001—600 册
ISBN7-5602-1/1009-0/K·76		定价:5.00 元



张文奎教授 1989 年 3 月在人文地理研讨班上发言



张文奎教授 1991 年 8 月在延边大学人文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致辞

序 言

张文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是复兴我国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也是我国人文地理研究与教学领域的伟大实践者。在坎坷不平的一生中，他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以孜孜不倦与刻苦钻研的精神和惊人的毅力，在教育战线和人文地理领域辛勤耕耘了四十多年。他不仅是教育战线上的一位良师益友，培养了大批本科生和硕士生，而且又是科学战线上的一位勇士，出版和发表了大量专著和科学论文，学术成果累累，在很大程度上填补和丰富了我国人文地理学科。

在全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李旭旦先生逝世以后，继老前辈鲍觉民先生之后，他被委以重任，担当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还倡导成立了全国高校人文地理教学研究会，担任理事长。正当他壮志满怀，为振兴我国人文地理学科而努力工作的重要时刻，由于疲劳成疾，心脏病复发，于1991年10月31日病逝在筹开学术会议的途中。他的逝世是我国地理学界的重大损失，使我们无限惋惜和悲痛。

为了缅怀张文奎教授和激励人们去振兴祖国的人文地理事业，我们决定出版《张文奎人文地理论文选集》。

《文集》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为悼念文章，是由我国人文地理学界的前辈吴传钧和钱今昔两位先生和张文奎教授的弟子所撰写的纪念文章；第二部分是张文奎教授的部分论文，选择了张文奎教授就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行为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区位论和城市地理学等方面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论

张文奎教授
1990年11月在中国
地理学会人文、经济
地理学术讨论会上发
言



全国高师人文地理学教学研讨会理事会全体理事合影(1987年7月)

目 录

为发展地理科学而鞠躬尽瘁的人	吴传钧	1
——怀念文奎同志	钱今昔	4
缅怀恩师张文奎教授	王 力 刘继生	9

作者论文选

开展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必须解决几个根本	
认识问题	13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	30
十年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的进展	37
论不同社会制度下生产布局的共同原则	48
西方计量地理学的发展及其在人文地理学研究	
中的应用	60
西方行为地理学的发展和现状	80
行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92
西方政治地理学研究中的主要流派	105
地缘政治学——西方政治地理学中最重要流派	119
论国力类型的划分及其理论与实践意义	141
杜能的农业区位论与农业布局	152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西方工业布局的基础理论	175
高兹的海港区区位论与运输布局	190
论中国城市的职能分类	196

作者论著目录

张文奎专著及参加编写著作目录.....	232
张文奎译、校订专著目录.....	233
张文奎译文目录.....	234
张文奎论文目录.....	234
张文奎参加学术会议论文目录.....	237

张文奎著书

1981	《中国音乐史》
1983	《中国音乐史》
1985	《中国音乐史》
1987	《中国音乐史》
1989	《中国音乐史》
1991	《中国音乐史》
1993	《中国音乐史》
1995	《中国音乐史》
1997	《中国音乐史》
1999	《中国音乐史》
2001	《中国音乐史》
2003	《中国音乐史》
2005	《中国音乐史》
2007	《中国音乐史》
2009	《中国音乐史》
2011	《中国音乐史》
2013	《中国音乐史》
2015	《中国音乐史》
2017	《中国音乐史》
2019	《中国音乐史》
2021	《中国音乐史》

为发展地理科学而鞠躬尽瘁的人

——怀念文奎同志

吴传钧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50年代初期，在政治上“一边倒”的形势下，国内文教科研究工作莫不以前苏联为模式。经济地理学作为一门带有社会科学性质的地理学分支，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就尤其深远，从理论到方法，差不多都以苏联学者的说法和做法为准绳。至于人文地理学由于在前苏联被批判为唯心主义的“伪科学”，从而被视为禁区，更无人敢问津。

到了1957年，我看到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地理学概论》一书，论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问题，篇幅虽不大，内容却不人云亦云，作者是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的一位老师张文奎。不久听说他被划成右派，传说原因和这本书的内容不同苏联专家唱一个调多少有些关系。在这股反右狂风之下，在地理界好些原来从事经济地理教学和研究的人，鉴于这门学科的政治敏感性太强而纷纷改行搞自然地理工作了。

十年浩劫使国内经济地理界的队伍进一步削弱，几乎到了完全解体的边缘。待到70年代中期科研工作才逐步恢复。为了巩固经济地理队伍不再流失，我和一些同志发起通过全国协作来编写《中国农业地理丛书》，但在工作过程中仍不时受到来自左的干扰。

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拨乱反正，工作才走上正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恢复了经济地理研究室和世界地理研究室，我被任命为副所长兼管这两个室。正在这个时候，张文奎同志代表东北师大地理系来所商谈双方合作编写《日本经济地理》的事。我和他初次相识，发现他思路开阔，言谈坦率，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并得知他已结束了坎坷的经历而为他高兴。

1979年底，中国地理学会在广州召开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旭旦老师高瞻远瞩，在会上首次倡导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从此国内对人文地理学有同好的同志在得到科研和教育双方领导部门的支持下，逐步组织起来，开展了频繁的学术活动，我和文奎同志也在这个浪潮之下走到一起来了。不仅增加了相知，而且提高了共识。也许因为我年长他十岁，他对我十分尊敬，我在历次人文地理学术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他都录音下来参考，而且还复制一套送我保存，我觉得这真是体现友谊的最好纪念。

1985年5月，在西安外语学院举行“中美人文地理研讨会”期间，我和文奎住在邻室，我发现他利用开会间歇和晚间或者读书，或者写作，孜孜不倦直到深夜，而第二天黎明前又起床工作，到了焚膏继晷的程度，我劝他注意身体，他却笑笑说：“不妨事，我已习惯了”。他的这种勤奋治学的精神，实在使我感动。

李旭旦老师身患严重心脏病，但为了发展人文地理学，自1980—1985年期间，连续带病主持多次学术会议，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人文地理分册》和《人文地理学概说》，翻译美国名著《地理学思想史》，真可谓呕心沥血，终于心力交瘁撒手而去！我们都陷于沉痛悲哀之中，我和文奎都感到加重了继承旭旦老师工作的责任感。从此，他日以继夜编写出了《人文地理学概论》，《人文地理学词典》和《政治地理学》等好几部重要著作，不折不扣地以具体行动来实现这个心愿。而我却由于工作头绪太多，身不由己，经常为参加会议，评审科研成果以及处理国内外来信

等等而分散精力，为不能集中致力于科研工作而苦恼。再加上连续胃出血，体力下降，更有力不从心之感。以致对人文地理工作觉得无所建树而内疚不已！

1990年10月，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联合学术研讨会”，根据中国科协要求学会领导年轻化的精神，周立三、鲍觉民先生和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年过70的人，都主动辞去了两个专业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的职务。关于继任人选，在人文地理方面通过协商，大家认为文奎最合适，就一致地推举他担任主任委员。希望他通过这个组织，在加快培养人文地理工作接班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方面大展宏图，发挥更大的才能。孰知时隔不久，他即由于操劳过度而病逝于南下筹开专业会议的途中！噩耗传到北京，凡是熟知文奎的同志，又一次陷入了沉痛悲哀之中。在我看来，他还是“风华正茂”，正可以为我国地理事业大作一番贡献的时候，不期竟然先我而去，这对地理界来说，实在是损失太大了。他同旭日老师一样是为了发展中国人文地理学而鞠躬尽瘁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无私而重大的贡献。

感谢东北师大出版《张文奎人文地理论文选集》，这正表达了广大地理界的同志们对他的怀念和尊敬之情。让我们共同担当起他的未竟工作，继续努力吧！

——1993年清明于北京中关村

一片丹心祭文奎*

钱今昔

(华东师范大学)

是1950年，建国之初，那一个热情昂扬的时代。

我，只是一个30余岁的青年，曾在建国前出版了一本理论书——《新哲学的地理观》。虽然仅是草创，但或许是第一本吧！因此，曾收到不少鼓励者的来信，其中包括孙敬之、李旭旦和张文奎等的热烈支持的信。这是文奎和我通信往来的开始。当时，他只是22岁的青年，是东北师大地理系的助教。

1955年，北师大经济地理进修班，在苏联专家业务指导下，在全国穿线实习，到达了上海，文奎是班长，曾到华东师大访我。那时他已出版了《经济地理学概论》，这是建国后第一部国人此类著作，引起了广泛的赞许，为不少大学的地理系采用为教科书。他是那样的年轻有为，壮健微胖的身子，爽朗的语言，侃侃而谈，交流着对国外地理研究的体会与意见，真有些相见恨晚之感。总的说来，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设想，苏联的教材虽然有特点，可是不够全面，在吸取的前提下，还要多发挥我们自己的设想，多充实与提高。

以上，不过是一些顺礼成章的合理设想，可在极左思潮的时代却是犯忌的。1957年“反右”声中，我听说文奎被错划了，罪

* 选自《人文地理》，1991年，第4期。

名是以班长身份代表进修班全体学员，对苏联专家提了一些意见。我未参加该班，也不知具体的意见是什么？但我想学术上的诚意探索，不人云亦云，或者便是文奎致厄的根源吧！

以后，对文奎来说，是长达 22 年的不公正待遇。虽然想起被阻隔的友情，总感到心头的隐痛，偶闻传言，或惊或释，然而一种怅惘若失的情感，浮上心头，往往为知友——李旭旦和张文奎等的处境而担忧。

中国终于摆脱了不断运动的自扰阶段，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春天。1978 年旭旦和文奎都告平反，一旦相见，促膝深谈，感慨万千，莫不以奋其余生，为新时代地理科学的发展献出一颗丹心来自勉和互励。

1981 年 5 月，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在杭州开会，会上李旭旦先生提出了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倡议。人文地理学已有 20 余年受苏联某一学派之攻击，而在中国无容身之地了。虽说此时它已是世界潮流之一股、学术研究之必需，可是在那时倡议复兴，还是或多或少担一些风险的，因为“四人帮”的余毒尚猖，“心有余悸”之忧未灭。可是文奎、吴传钧、郭来喜、邬翊光、陈尔寿和我等还是积极地响应了。并经大会推选，以旭旦为首，组成了上述七人的人文地理学工作筹委会。以后，虽然也遇到了一些离奇的干扰，但终于逐步克服。而在 1984 年暑期于北京，由中央教育部和中国地理学会共同举办了“人文地理研究班”，聘请了约 20 位专家、教授做老师，吸引了全国各高校地理系的中、青年教师做学员，进行了系统性的培训。然后，由学员返校，分别开设人文地理学概论和分支学科的课程。

那时，旭旦先生心脏病沉重，日常工作就由文奎担任，他在开班前早已到京，筹划、联系、接待、安排教学与师生的生活，上上下下，几无片刻之暇。而且还亲自担任“行为地理学的基本问题”和“新技术革命和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课题”两讲。作为教师之一的我，目睹他两鬓已苍，心脏有病很累的样子，曾多次劝

他：“放下一些工作吧！”可他总是回答：“累一些没关系，工作总是要人做的。何况，行为地理学和钱老你研究的文化地理学原都是禁区，要冲破，总是要有敢闯的人吧！”直到如今，此情此景，还恍然如在我的眼前。

1985年，约52万余字的《人文地理学论丛》，也就是暑期人文地理研究班的讲稿汇编，很快就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也就为建国后全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首批国人自创的精神食粮。

1985—1986年“人文地理学概论”在许多大学的地理系和经贸系被列为选修课。1987年，由国家教委下达，在高师地理系定为必修课。这时，面临缺乏教材和大纲的问题。是文奎，他倡议成立了全国高校人文地理教学研究会，于是在长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由会议推举了他为理事长、金其铭和我为副理事长。编订了数十家院校代表共同拟定的“高校人文地理学概论教学大纲”，又提出了以文奎新编、刚出版的《人文地理学概论》、那本40余万字的呕心沥血写成的作品为教材，解决了学科前进途中的两大难题。

1988年，人文地理教学研究会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年会。此时金其铭所著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也已出版。经文奎指出两本专著，都是总论和分论兼具，但张著“分”重于“总”，金著“总”重于“分”，可以互相补充。眼下的问题是要发展有关人文地理学的专著，进一步支持《人文地理》季刊编辑部的组稿工作，因为它是我国唯一一本具有国际水平的人文地理学刊物，还要考虑一下人文地理学的参考地图和图表等项工作。会上的交流、会后的倾谈，无拘无束，真使我感到学术友情的可贵，是人世间少有的。

1989年，研究会在上海举行第三次年会，那是一次国际性会议，有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人文地理学童承康教授和德国不来梅大学的陶普曼教授来会，为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创始人胡焕庸教授作九十寿诞之庆，总结胡老的学术成果，并开展人文地理参考著

作、图片的编写工作。文奎在半年前便跟我通信，详细筹划了那次会议的议程。后来虽因火车到达常州后折回长春，未能到达上海来会，可仍打来电报，并转托中、青年老师携来亲笔信。所以，在会上，我曾说，这是文奎未到可仍是文奎主持的会议。文奎真如天上的神瑛侍者，无时无刻不以生命之泉来灌溉中国人文地理学的这一株幼苗。

1990年，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的议题很多、交流的学科繁众，我又忙于能源经济的一些研究工作，在会前会后同文奎交谈，都感到不能满足渴思之情，乃在他离沪之前，到他客舍作了一次长谈。那时，中国科协曾有精神，希望学会领导年轻化。我已年超七旬，深感必须辞退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之职，而文奎少我十年，仅60余岁，还是可以干一阵子的。只是他心脏病发，要防不测，工作还宜劳逸结合的。想不到那一夕之谈，竟是40余年老友间的最后一面，更想不到，年轻十岁的他竟会先我而去，思念及此，不禁泪如雨下，失声号哭。

改革开放十年来，学术界的友人可说有三种类型，一是整天整天开会，忙于会务或发言，很少著作。另一些是较重实践和写作，较少开会，尚能调节。还有一些是既热心公益，会多事多，还大量实践和写作，这第三类人物可以说是把生命扑在学术上，为工作和学术而献身，最值得尊重的人，文奎就属于这一类，先文奎而去的李旭旦先生也属于这一类型。文奎以后担任了中国地理学会的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仍是人文地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他还带研究生，开辟新课，同时又陆续写作与主编了《经济地理基础》、《人文地理学概论》、《政治地理学》等专著，并主编了《人文地理学辞典》等巨著，各本著作都走在时代的前端，往往是国内第一本，也不亚于国外的著作，要说“国际先进水平”，我说文奎是真的当之无愧的。

可人身毕竟是血肉之躯，文奎就这样地为工作、为学术离我

们而去了。那是1991年，人文地理教学研究会第四次会议将在福州举行之前，已有数月，文奎、其铭和我三人之间，信函频通，商讨会务，并同主办单位福建师大的江萍副教授、袁书琪副系主任鱼雁往来。10月31日文奎由长春乘火车去福州开会，途中突然心脏病发，到上海后送往医院，也只说了“看来我不能到福州了，希望今昔到福州，开好这次会议”。其他家属等等都未及再说，就撒手而去了。每念及此，我真感到一个老知识分子，不念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无时无刻总是把学术工作视为生命的第一要义，那种一片丹心为学术、春蚕到死丝方尽、望帝春心托杜鹃的精神将何以能传流而不息啊！

我自知是重学术、轻开会的一流人，晚年来愈益厌恶那些连绵不息的会议。比之于文奎我是差得远了，十分感到内心的沉重。打开文奎送我的许多宏著，有好多篇序言中都提到了我的鼓励和审稿工作。特别是那部“人文地理学词典”中有“中国人文地理学家”一栏，列举了我国数十个当代人文地理工作者的业绩，一破有些辞典只谈洋人，不顾国人的缺陷，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却不列入其中，虽是他为人谦虚，可我总觉得有所不足，故曾去信建议在再版时务希把文奎和孟春舫教授的名字及成果纳入。这，我想，对一个忠实于学术，献身于工作的学术志士是必须的。当然更重要一点是要把文奎的一些未竟事业继续完成，并要动员后人，对旭旦、文奎这样为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学者和志士，在学术上、成果上进行专题的研究，以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开展我们的学术研究！

——1991年12月20日于上海